

## 国外档案学研究的“情感转向”

曲春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100)

**摘要** “情感转向”是当前国外档案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情感理论被引入档案学领域,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阐释。档案学者运用情感理论分析档案现象,提出情感价值作为档案鉴定标准以及情感公正、不可能的档案想象和想象的档案等观点。研究者还从实践层面分析了社群档案与情感体验、情感与离散档案问题处理以及档案与情感创伤等特定情境中的档案与情感问题。透过情感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社会中的档案现象,“情感转向”为档案学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情感转向 情感公正 档案学研究 社群档案 离散档案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0.04.019

## The “Affective Turn” in Foreign Archival Studies

QU Chunme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The “affective turn” has emerged in current archival studies as a new research orientation. Affect theories are introduced to archival discourse and get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explanation. By applying the affect theories to archival phenomena, foreign archival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some new ideas and concepts, including affective value as an appraisal standard, emotional justice, impossible archival imaginaries and imagined records. Researchers also analyze the issues about archives and affects in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such as community archive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affects and displaced archives, archives and trauma. Through the lens of affect, the “affective turn” in archival discours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observing and reflecting archival phenomena in society.

**Key words:** affective turn; emotional justice; archival studies; community archives; displaced archives

### 0 引言

近年来,“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受到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有可能演变成一种“范式转变”。美国社会学者帕特里夏·克劳夫(Patricia Clough)认为西方学界的“情感转向”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早期,批评理论家和文化

评论家为了回应后结构主义和解构的局限性,从而将兴趣转向情感研究<sup>[1]</sup>。进入21世纪以来,“情感转向”由社会学、心理学、文化批评及女性主义等研究领域迅速扩展到几乎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整个领域<sup>[2]</sup>。在文化研究领域,“情感转向”被看作是一个跨学科的新方法,它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获取方法论指导,并从不同行

业获取有关情感方面的见解与启示<sup>[3]</sup>。可以认为,“情感转向”是一种以情感为视角的研究取向,体现了不同学科领域有关情感问题的一种研究趋势,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档案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能够储存、激发和建构人类的情感体验。透过情感视角来观察和思考档案现象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档案学领域“情感转向”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 1 档案学领域“情感转向”地出现

在英语文献中,有关情感问题的讨论首先涉及与情感相关的三个术语“feelings”、“emotions”以及“affects”的辨析。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sup>[4]</sup>,而在其他一些学科和专业领域,这三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区分,甚至有时是可以互换的<sup>[5]</sup>。档案学者玛芮卡·西弗(Marika Cifor)认为,affects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和历史建构的范畴,既包括同时又超越feelings和emotions<sup>[6]</sup>。社会学者杰奎林·威尔逊(Jacqueline Z. Wilson)和弗兰克·戈尔丁(Frank Golding)认为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这三者可以看作是同义的<sup>[7]</sup>。复旦大学美学和哲学教授陆扬在讨论“情感转向”的理论资源时,谈到了对“affect”一词的理解及翻译问题,他认为考虑到语言约定俗成的释义习惯,不妨暂且把affect译作“情感”,但它和我们通常译作“情感”的另外两个词feeling和emotion都有不同,“追本溯源,affect之为情感,作为一个哲学术语,确切地说是指主动的情感施与以及被动的情感接受和调节。它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sup>[8]</sup>基于目前对情感理论和情感转向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affects可以理解为有关情感体验的一个综合表达,它不同于但又涵盖了feelings和emotions,并沿用“情感”一词来指称affects,以“情感转向”一词来指称英语文献中的‘affective turn’。

档案学领域的“情感转向”出现在21世纪初。最近几年来,西方档案话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个人的、具身的和情感认知获得了话语空间并受到严肃对待,这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的或机构的、中立的和有形的传统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sup>[9]</sup>。传统上,档案一直被视为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原始记录,是自然形成的遗留物或累积物,是客观的、“神圣”的证据,而档案工作者则被认为是中立的、“毫无偏见”的保管者,这是对档案和档案职业

的一种理想化认知。在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下,西方档案学者不再固守客观、中立等传统观念,开始思考档案中的权力因素及其影响<sup>[10]</sup>,档案不再是“单纯”的副产品,档案工作者也不再被视为被动的文件接收者,而是档案活动和社会记忆的积极参与者与构建者。与此同时,“情感转向”中的一些文化学者开始发现和讨论情感与档案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一些有创见和影响力的情感理论和观点。这一研究取向和相关理论成果引起了档案学者对档案与情感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们将情感理论引入档案话语,并结合档案实践中的情感体验进行阐释与探讨,由此引发了档案学研究领域的“情感转向”。

2014年11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的“情感与档案”研讨会被看作是档案理论“情感转向”的重要节点,以及由此形成的2016年《档案科学》(Archival Science)的档案与情感特刊,可以视为档案学研究中“情感转向”的标志<sup>[11]</sup>。人文学者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认为:“档案研究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一项可以而且仍然能够充满感性、感情和浪漫激情的活动”<sup>[12]</sup>,受到雅克·德里达《档案热病》(Archive Fever)一书的影响,人们对档案重新产生了兴趣,并将档案看作是“权力和意义的场所,或者欲望与失去的所在”。杰米·李(Jamie A. Lee)认为,档案体的情感本质意味着形变,这是跨学科逻辑方法的一种表征,它向普遍存在的档案标准发起挑战,并有可能重构档案方法<sup>[13]</sup>。档案学领域“情感转向”地出现,是国外档案学界对客观的、中立的、固化的传统档案观念的一种质疑与反思,意味着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加多元和动态的档案观念,并将进一步丰富和推进档案领域理论模式和实践方法的变革。

## 2 理论探索:情感理论在档案学领域的引入和发展

玛芮卡·西弗、米歇尔·凯斯韦尔(Michelle Caswell)和安·吉利兰(Anne Gilliland)等人是将情感理论引入档案话语的主要代表学者。其中西弗(2016)在《情感关系:将情感理论引入档案话语》一文中,将三位文化研究学者安·克维特科维奇(Ann Cvetkovich)、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和劳伦·勃兰特(Lauren Berlant)的情感理论观点引入档案学领域,并在社会正义框架下运用情感理论来分析社群、社群档案及其情感关系问题<sup>[14]</sup>。西弗等人

有关情感理论的研究成果,吸引了更多的档案学者开始认识并进行档案与情感问题研究。

### 2.1 一种鉴定标准:作为“情感仓库”的档案

文化理论学者安·克维特科维奇认为,包括档案材料在内的“文化文本”是“情感的仓库”,也是与其形成和接收相关的情感活动的仓库。在社会正义范式下,情感价值应当被置于重新解释和扩展鉴定理论与实践的中心维度<sup>[15]</sup>。西弗认为,克维特科维奇将档案文件视为情感仓库的理论设定,使得在收集和初始鉴定阶段对现时情感因素的鉴定变得合理。它还需要后期对档案的持久性情感特征进行再次鉴定,这些特征只有在经过时间、研究或干预活动后才会显现。她提出情感价值应当作为一种鉴定标准应用于档案鉴定工作,它可以作为一种矫正力用来解决档案中的权力不平等<sup>[16]</sup>。西弗的观点强调了情感价值在权衡档案与其形成者、主题、利用者、大型社群以及权力系统的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非传统意义上的档案而言,如社群档案、家族/家庭档案以及其他民间文书档案等,它们通常不在官方的或传统的档案机构收藏范围内,而其本身所具有的情感价值往往处于档案文本意义的核心,成为判定其档案价值的重要依据。尽管如此,由于档案的情感价值本身所具有的非普适性、不确定性及难以衡量性等特点,同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群体性或地域性特征,使得情感价值能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践意义的、可操作的鉴定标准仍然有待实践工作的检验。

### 2.2 情感公正:作为“见证人”的档案工作者

西弗总结并发展了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学者萨拉·艾哈迈德所提出的有关痛苦和见证人(witness)<sup>[17]</sup>理论观点。在艾哈迈德看来,痛苦需要一个见证人,正是这种见证关系赋予痛苦以超越个体脆弱边界的生命力并验证它的存在。据此,西弗提出,作为见证人的档案工作者被深深地卷入情感关系的网络中,这就要求档案领域拓展其伦理取向,以促进情感公正<sup>[18]</sup>。詹姆斯·劳瑞(James Lowry)以一名档案学者和项目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在阅读那些有关肯尼亚的散失档案时所经历的情感体验和职业反思,佐证了这一观点的现实可能性。他认为档案工作者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见证离散档案<sup>[19]</sup>,其中最直接的一层就是对离散档案中所隐含的生活与情感的见证,这促使档案工作者扪心自问,“我跟这些生活与情感是一种什么关系?”他写道,在档案馆的阅览室中“看着这些文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对

话者,这些生活与情感,它们发生在与这间阅览室相隔万里的某个地方”“情感融入了我对这些档案文件的阅读中,使我可以见证个体的生活和情感,并让我能够见证该历史与保管背景下更大范围的生活和情感”<sup>[20]</sup>。档案工作者自身所具有的情感体验及其见证人的身份,使得情感公正成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西弗提出,实现公正还意味着档案中那些被边缘化的声音能够浮出水面并得到倾听,她认为艾哈迈德所构建的情感理论同时复杂化和强化了这种情形,那就是“社群是基于情感建立起来的,并且他们的情感必须被视为档案关系的一部分”<sup>[21]</sup>。西弗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后现代主义者对于档案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解构的一种回应和补充。哈里斯·凡尔纳(Harris Verne)关于档案是“窗户碎片”<sup>[22]</sup>的比喻,喻示档案远非简单地映照现实,它在反映所记述事件的同时,也在改变和干扰着现实影像的形成。西弗将情感纳入权力权衡的复杂档案关系中予以考量,对于重建档案信任具有重要意义。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收集、鉴定、保管和提供利用等整个管理过程的政策制定者、直接参与者和重要见证者,他们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偏好直接影响他们的政策制定、价值判断以及收集、鉴定、保管和提供利用等行为,这是情感在档案与权力关系中的体现。将情感公正作为档案工作者的伦理追求,有助于社会正义框架下档案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实现。

### 2.3 不可能的档案想象和想象的档案

吉利兰与凯斯韦尔认为,人类学者阿琼·阿卜杜拉(Arjun Appadurai)和克劳迪亚·施特劳斯(Claudia Strauss)等人提出的想象理论,可以用于解释和分析档案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同档案定义及其权威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她们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和发展了女性主义文化学者玛丽安·戴弗(Maryanne Dever)关于缺失的证据以及想象的“宝藏”等观点,提出了两个新的专业术语——不可能的档案想象(impossible archival imaginaries)和想象的档案(imagined records),用以描述和讨论档案理论及实践领域中对那些不存在的、缺失的或不可获得的档案及其内容的个体或集体想象<sup>[23]</sup>。此前凯斯韦尔在探讨社群档案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出了档案想象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动态方式,是“社群基于共同的过去,通过档案干预有创造性地共同重构未来愿景的一种动态方式”<sup>[24]</sup>。在档案想象的概念基础上,吉利兰与凯斯韦尔进一步提出了不可

能的档案想象,用以解释在档案或其预期内容缺失或永远不可能获得的情况下,档案想象是如何发挥作用的<sup>[25]</sup>。在不可能的档案想象中,人们对权威的质疑、错位的信任以及对发现真相的渴望等情感引线,促成了想象的档案的“产生”。吉利兰与凯斯韦尔认为,这两个新术语可以提供重要的情感制衡,有时甚至与法律的、行政的、历史的和法庭的这些占主导地位的证据概念相抵触,而后者常常无法解释档案在引起激励、鼓舞、愤怒和创伤等方面所具有的力量<sup>[26]</sup>。在她们看来,对缺失档案及其内容的想象和预期会激起人们不同的情感反应,从而成为一种影响和塑造档案的力量。只要这些想象的或预想的档案不可获得,或者它们的内容或其存在纯粹只是一种猜测,那么它们就会激发出各种叙述、假设、愿望、憧憬、恐惧和不信任。这就是戴弗所说的“塑造档案的力量”<sup>[27]</sup>。

吉利兰与凯斯韦尔关于档案想象与情感关系问题的讨论,突破了认识论的束缚,颠覆了人们对于档案概念的传统认知方式。档案既可以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也可以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尽管这些不可能的档案想象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档案,也永远不可能作为一种法律证据而存在,它似乎更可以被视为一种认知上的存在,并借由档案行为在想象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系。人们可以通过想象,去感知或推断那些缺失的或者不存在的档案或档案内容,并通过文学作品、艺术创作等形式得以体现,从而弥补和回应特定人群的情感需求,特别是对于那些特定人群(如种族屠杀的幸存者及受害者家属等)而言,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情感意义。发现和解读档案与想象之间的情感联系,为档案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打开了一扇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窗户。在情感的驱动下,档案想象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也有可能成为档案现实。劳瑞认为现在保存在英国的肯尼亚散失档案就是现实存在的“想象的档案”<sup>[28]</sup>。对于离散档案的形成的国家而言,因为面临档案的缺失,人们会在民族情感以及个人情感力量的驱动下,去想象和推测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些档案,而这些档案有可能就真实地存在于某个还未被发现或未被告知的场所。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档案想象,推动人们去寻找和发现那些可能存在的缺失档案,并成为推动离散档案的归还与索还的重要驱力,而这些离散档案也极有可能从想象的档案变为现实的档案。不可能的档案想象还有可能产生新的档案需求,促成某些想象的档案在未来成为真实的档案。

将情感理论引入档案学领域,不仅仅是引入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话语与分析工具,更是对档案和档案工作中传统观念的一种反思与创新。西弗等人对情感理论的引介及其在档案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促使档案界打破常规观念,认识并关注情感以及情感研究在档案理论与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使档案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去思考情感、正义、权力、想象、客观、中立等概念在档案语境中的地位、关系和相互作用。

### 3 实践经验:特定情境中的档案与情感体验

#### 3.1 社群档案与情感体验

社群档案是指基于共同的地域、文化、信仰、背景以及其他共同身份或兴趣的特定群体成员所形成的文件集合<sup>[29]</sup>。目前英语文献中有关LGBTQ社群档案与情感体验的研究最具典型性。同其他社会边缘群体一样,LGBTQ社群常常被传统的档案工作所忽视,西弗认为通过社群档案获得身份认同和情感体验对社群成员具有重要意义。她在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中发现,作为社群档案鉴定标准的情感价值至少与传统的历史价值或研究价值同等重要。尽管由文件形成者和社群档案馆集体成员共同介入的参与式鉴定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档案类型,但考量情感价值的档案鉴定活动在打破主导性权力结构、收集记录不足的社群档案材料、拓展文化背景及其了解渠道等方面具有潜在价值<sup>[30]</sup>。杰米以两个LGBTQ档案馆作为研究案例,分析了利用者的情感是如何通过身体感觉在与档案的接触过程中被唤起的。杰米还将档案体与情感产生的“居间性”或“第三空间”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种游离的、不稳定的交叉间隙,是情感出现与消长的场所。这些档案“充满了间隙与沉默,它们由情感关系所生成,又生成情感关系,特别是创伤、羞耻、欲望以及(非)归属感等。”<sup>[31]</sup>西弗和杰米等人将情感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社群档案现象分析,是从不同角度对档案作为“情感仓库”的实践解读和理论阐释。社群档案是社群成员寻求权利、认同与情感支持的资源库,它不仅是知识的仓库,更是情感的仓库。人类的情感透过交错的时空在档案与身体、文本与背景、过去与现在甚至未来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档案能够激发情感,情感又会对档案行为产生影响,社群成员、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利用、管理和研究行为以及相伴随的

情感体验,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构成档案连续不断的背景联系,参与并影响着整个档案过程。

### 3.2 情感理论与离散档案问题处理

离散档案通常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未保存在档案所有国的档案<sup>[32]</sup>。造成档案离散的原因极其复杂,有关离散档案的转移、索还和归还等问题涉及档案所有国与所在国对档案所有权的争议,所以国际上有关离散档案解决方案的讨论主要侧重于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纠纷。在关注法律问题的同时,劳瑞从其多年从事国际档案工作实践经历和自身的移民家庭背景出发,运用档案学者引入的相关情感理论以及提出的新概念,从情感层面讨论了离散档案与其形成地与归属地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以转移并保存在英国的肯尼亚散失档案为例,提出透过情感有助于人们形成关于殖民国家在个人、家庭和社群等方面对肯尼亚所造成影响的更清晰的画面。他认为,情感不会作为散失档案形成时的鉴定标准,但基于情感因素所进行的再次鉴定将会证明档案保存在其形成地比在英国更具有影响力,因此散失档案应该作为产生它的档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被返还到其形成地<sup>[33]</sup>。结合离散档案的具体案例以及个人的情感体验,劳瑞肯定了情感理论对于离散档案研究以及解决与档案离散相关的国际争端的重要意义。情感理论在离散档案问题研究中的运用,进一步论证了情感在档案关系中的合理存在,以及运用情感理论分析和解决档案实践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3.3 档案与情感创伤

关注和探讨档案与情感创伤之间的关系,讨论档案在弥补或造成创伤中的作用与影响,是档案与情感研究领域的主要话题之一。前面所述及的档案与情感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档案与创伤问题,或者可以说是不同背景下对档案与情感创伤所进行的不同角度的思考。特别是关于创伤性事件档案及其所涉及人群的研究,更是进一步论证了档案行为与族群或个人情感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档案与情感研究的重要意义。

创伤性事件档案中的不实记载或歧视性用语,往往会对记录对象或其亲属、后代等造成严重的情感伤害,成为一种“情感武器”。研究者们发现,在关于弱势或边缘群体的档案文件中,常常会有关于记录对象的不实记载或不当用语,而事件的亲历者(尤其是档案中的记录对象本人)或者其亲属、后代等看到这样的记录内容时,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巨大的情感伤害。澳大利亚两位社会学者威尔逊和戈尔

丁从亲历者的角度,探讨了澳大利亚寄养儿童档案对于“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sup>[34]</sup>的重要意义,并结合自身作为寄养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分析了这些档案对记录对象所带来的情感创伤。例行的档案文件汇编是当年澳政府对儿童寄养过程进行官方监控的一个重要环节。当年儿童情况调查者的道德偏见以及被调查者(通常是寄养儿童的亲属)的不实陈述,造成了很多档案文件中有关寄养儿童情况的记录内容是不准确的。作者之一的威尔逊在长大后看到档案记载中关于她踢打母亲的暴力行为记载时感到极度痛苦,并急欲找到包括她母亲在内的记录活动参与者进行对质,以证实这件事从未发生过<sup>[35]</sup>。另一位历史档案研究者勒奈特·罗素(Lynette Russell)则通过自己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档案的研究经历,指出档案中有关原住民悲惨事件的记载以及其中的歧视性用语,会使他们的后代或亲属甚至这些档案的保管者,再次遭受情感创伤<sup>[36]</sup>。

来自档案记录本身的情感伤害,能够形成一种情感驱动力,促使创伤性事件相关人群迫切地想要采取某种行为,来澄清事实以减轻或弥补伤害,维护自身权利和人格尊严。威尔逊和戈尔丁认为,一方面档案的不完整以及记录内容的不准确,令人感到不安和愤怒;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档案的存在又能为记录对象提供辩护,能够明确或纠正一些模糊不清的记忆,以解决那些影响身份认同的叙述不连续性问题。因此他们提出,为了维护记录对象的尊严及档案研究成果的可信性,在对这些档案进行披露和解释时,必须包括事件亲历者的观点和见解<sup>[37]</sup>。

蓄意销毁档案也是对事件亲历者或相关者的一种情感伤害,甚至是一场“记忆屠杀”。在种族大屠杀中,施暴者不仅杀戮无辜生命,还会同时摧毁象征民族文化的场所和标志性符号等。人类学者哈里兹·哈里洛维奇(Hariz Halilovich)认为,对文件、照片、书籍和官方档案的蓄意销毁,对种族屠杀幸存者和其他的“记忆屠杀”受害者而言,是一种个体的失去和严重的创伤,是关于个人、家庭和群体毁灭的一种隐喻<sup>[38]</sup>。因此,档案重建对于事件亲历者的情感表达、记忆保存和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哈里洛维奇认为,在后种族屠杀背景下,重建个人文件和社群档案,对种族屠杀幸存者及其亲属而言,意味着一种有关寻找自身历史、重新确认身份、重建和维护连续性的尝试<sup>[39]</sup>。

民族志研究视野下的口述记录、影像档案以及社会学研究视野下的亲历者参与等形式,都是重建

创伤性事件档案的不同方法和路径。在档案重建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融入事件亲历者及相关人群的悲伤、喜爱、亲密、尊严等情感表达以及部分的想象和虚构。哈里洛维奇认为,在这一点上,口述记录的叙述者“跟那些参与形成或重建历史叙述的其他档案工作者并没有什么不同”<sup>[40]</sup>。正如戴弗所指出的,那些保存(或销毁)、收集、挑选和整理档案的过程是一种中间行为,这些行为塑造着我们所看到的档案,并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它们的可能含义以及它们所支持的历史叙述<sup>[41]</sup>。认识和研究档案中的情感因素及其所蕴含的情感力量,尊重和考量事件相关者的情感表达和观点态度,为创伤性事件亲历者或相关群体构建多角度和多种形式的档案叙述,才有可能为后来者提供寻找和发现真实事件的多种视角和选择。

#### 4 一点思考: 社会框架中的档案与情感问题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很早就提出情感是社会性的观点,认为只有在社会整体中,个人的情感现象才能得到解释。他将个人情感归结为集体情感,并用集体情感来解释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的秩序<sup>[42]</sup>。情感具有社会属性,并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框架中发挥作用,档案则是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或累积的历史记录。档案和情感既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也是有形或无形的社会事实,它们都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彼此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档案是情感的储藏库,它不是情感本身却承载着人类的情感表达与寄托,它无法感知情感,却是人类情感活动的重要媒介和源泉,情感是档案与社会关系纽带中隐秘而重要的一环。档案在很大程度上与形成、记录、保持、协调和(再)产生这样一些跨越时空界限的社会关系有关,其中包括档案与人、意识形态、制度、系统和世界之间的关系<sup>[43]</sup>。情感关系是档案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一种,并对其他互动关系产生影响。档案学研究不仅要关注档案活动本身所固有的结构性力量与理性逻辑,同时也要关注档案行为中所呈现出的非结构性特征与感性力量,关注档案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构建起与社会整体发展相关的研究取向和理论体系。档案学领域出现的“情感转向”,将档案置于情感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情感现象的社会框架之中进行讨论,为我

们探究档案现象和丰富档案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档案与情感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关于什么是情感、档案与情感的关系、档案是否具有情感价值、档案的客观性和具象性与情感的主观性和抽象性的矛盾关系等问题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争议,其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都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和验证。当前英文文献中对档案与情感的研究多聚焦于特定情境中的社群档案或与某一事件特别是创伤性事件相关的档案,比如多集中于对LGBTQ社群档案、寄养儿童档案、难民档案、大屠杀档案等的关注。关于特定情境中的档案与情感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因为这些与某些特定群体或特定事件相关的档案,往往具有更明显的情感价值,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情感价值成为这些档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价值意义,因而更易于明确认识和充分澄清档案与情感的关系,有助于明晰和深化对特定档案现象的问题分析与理论建构。但是,对档案与情感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讨论档案的情感价值本身,它还涉及对档案与档案人群(与档案生成及整个流转过程相关的个人或群体)的情感关系以及情感力量与社会影响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将档案与情感问题置于社会文化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讨论,可以透过情感视角来分析社会中的档案现象,通过情感纽带来洞察档案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调整和丰富档案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欧美档案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8BTQ091)阶段性成果。

#### 参 考 文 献

- [1] Clough P.T. The affective turn: political economy, biomedicine and bodies [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8, 25(1): 1-22.
- [2][8] 陆扬.“情感转向”的理论资源[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30-38.
- [3] 刘文. 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情感转向[J]. *广西社会科学*, 2016(9): 188-192.
- [4] Shouse E. Feeling, emotion, affect [J]. *M/C Journal*, 2005, 8(6): 26.
- [5][11] Cifor M, Gilliland A.J. Affect and the archive, archives and their affe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 issue [J]. *Archival Science*, 2016, 16 (1) : 1-6.
- [ 6 ][14][15][16][18][21][30][43] Cifor M. Affecting relations: introducing affect theory to archival discourse [J]. *Archival Science*, 2016, 16 (1) : 7-31.
- [ 7 ][35][37] Wilson J Z, Golding F. Latent scrutiny: personal archives as perpetual mementos of the official gaze [J]. *Archival Science*, 2016, 16 (1) : 93-109.
- [ 9 ][20][28][33] Lowry J. Radical empathy, the imaginary and affect in (post) colonial records: how to break out of international stalemates on displaced archives [J]. *Archival Science*, 2019, 19 (2) : 185-203.
- [10] Schwarrzjm J.M, COOK T. Archives, records,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 [J]. *Archival science*, 2002, 2 (1-2) : 1-19; COOK T, Schwartz J. M. Archives, records and power: from (postmodern) theory to (archival) performance [J]. *Archival science*, 2002, 2 (3-4) : 171-185.
- [12] Paul H. Performing history: how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s shaped by epistemic virtues [J]. *History and Theory*, 2011, 50 (1) : 1-19.
- [13][31] Lee J A. Be/longing in the archival body: eros and the “endearing” value of material lives [J]. *Archival Science*, 2016 (16) : 33-51.
- [17] Cifor在引入Ahemd的理论观点之前,首先梳理和分析了Ricardo Punzalan (2009)和Michelle Casewell (2014)等人关于档案工作者是见证人的观点,并回溯了Frances、Guerin和Roger Hallas (2007)关于见证的理论分析,提出见证伴随着特定的责任与回应,包括旨在情感公正的情感责任与回应。
- [19] 离散档案 (displaced archives) 通常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未保存在档案所有国的档案。Lowry认为现在保存在英国的来自肯尼亚的散失档案 (migrated archives) 是后殖民时代离散档案的典型代表。
- [22] Harris V. The archival sliver: power, memory, and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 [J]. *Archival Science*, 2002, 2 (1-2) : 63-86.
- [23][25][26][27] GILLILAND A J, CASWELL M. Records and their imaginaries: imagining the impossible, making possible the imagined [J]. *Archival Science*, 2015, 16 (1) : 53-75.
- [24] Caswell M. Inventing new archival imaginari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identity-based community archives [M] // DANIEL D, LEVI A. Identity palimpsests: ethnic archiving in the U.S. and Canada. Sacramento: Litwin Books, 2014: 35-55.
- [29] Flinn A. Community histories, community archives: som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2007, 28 (2) : 151-176; Flinn A, Stevens M, Shepherd E. Whose memories, whose archiv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archives, autonomy and the mainstream [J]. *Archival Science*, 2009, 9 (1-2) : 71-86.
- [32] 冯惠玲, 加小双, 李毅卓. 关于离散档案处理的历史发展与国际动向 [J]. *档案学通讯*, 2018 (4) : 4-9.
- [34] 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先后共有近50万儿童从英国和英国的殖民地“被带到”澳洲,并被送进当地的慈善机构、孤儿院或者寄养家庭,以达到快速增加当地人口的目的。在寄养期间,这些儿童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甚至在成人后也承受着情感伤害和社会压力。这些人被称为“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Forgotten Australians)。参见:陈小方. 澳大利亚总理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道歉 [N/OL]. *光明日报*, (2009-11-12) [2019-09-26].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11-26/1984875.shtml>.
- [36] Russell L. Affect in the archive: trauma, grief, delight and texts. Some personal reflections [J].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2018, 46 (2) : 200-207.
- [38][39][40] Halilovich H. Re-imaging and re-imagining the past after “memoricide”: intimate archives as inscribed memories of the missing [J]. *Archival Science*, 2016, 16 (1) : 77-92.
- [41] DEVER M, Newman S, Vickery A. The intimate archive: journeys through private papers [J].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2010, 38 (1) : 94-137.
- [42] 郭景萍. 涂尔干: 整合社会的集体感情研究 [J]. *学术论坛*, 2006 (3) : 129-133.